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PRING VOLUME, 2010

邓正来 主编

中国深度研究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春季卷

2010年3月（总第30期）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PRING VOLUME, 2010


邓正来 主编

中国深度研究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春季卷

2010年3月（总第30期）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为了中国

林耀华



一九九四
年元月

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邓正来

主编助理

程 农 吴冠军

学术委员

林毅夫	周国平	许倬云	林毓生
张维迎	孙周兴	童世骏	姜义华
许纪霖	何光沪	马 敏	黄宗智
王 焱	俞吾金	汪 晖	张曙光
葛兆光	季卫东	桑玉成	史晋川
陈嘉映	汪丁丁	时殷弘	陈平原
秦亚青	张 军	周其仁	葛剑雄
赵汀阳	林尚立	高 毅	郑杭生
陈弘毅	邓晓芒	张小劲	徐 勇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纳 日
徐 贲	姚 洋	张旭东	宋新宁
杨念群	郝雨凡	王铭铭	许章润
秦 晖	任剑涛	周晓虹	阎云翔
姚先国	郁建兴	邓正来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张小劲、李春峰的《“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一文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8份政治报告或工作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意义演变进行了研究,并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从价值到制度层面民主话语的演变和十六大以来民主话语的最新倾向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很多较为重要和新颖的结论。韩秀义的《无理论: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通过对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的批判性检视,在分析主流宪法教材关于宪法之定位的偏颇、对重要问题(如中国宪法的政治性渊源、意识形态对宪法分类的意义等)的遗漏等缺陷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主流宪法学教材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无理论依托的宪法典诠释型编著体例,其症结在于对中国宪法的单一化与理想化假定;作者还对他所建构的“一体二元”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进行了探讨。白彤东的《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通过作者对美国教育的多年切近观察,尤其是对美国教育的种种弊病的考量,对中国各级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其对中小学是否需要素质教育、大学通识教育、哲学专业教育等问题均提出了较为独到的见解。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目 录

2010年3月(总第30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五)	
张小劲 李春峰 “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 报告为文本的分析·····	1
韩秀义 无理论：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	27
白彤东 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	41
学术专论	
朱维铮 重考商鞅变法·····	56
李永晶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	67
学术综述	
沈志华 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	80
海外专论	
约瑟夫·拉兹 邓正来译 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	95
贺伯特·博德 面对亚现代的新约福音·····	106
论坛：“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	
编者按语·····	117
邓正来 对哈耶克的一种个殊化研究·····	118
朱维铮 浅说邓正来二书·····	119

童世骏	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重视哈耶克	120
林尚立	自由的难题：从生命存在到社会存在	121
王铭铭	从邓正来的为学想到三个“不等于”	122
韦 森	“哈耶克问题”到底是什么？	124
萧功秦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理对发育公民社会的意义	125
郭苏建	哈耶克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127
刘 擎	计划与无知	128
姚中秋	作为一种学术典范的邓氏翻译-研究	129
洪 涛	自然乃功成——邓正来先生的哈耶克研究	130
刘清平	能不能从理性的有限推论出正当的自由？	132
吴 炫	理性设计·自发秩序·中国问题	133
罗 岗	哈耶克的真问题	134
苏振华	什么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	136
任 晓	探究内生秩序	138
刘建军	哈耶克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140
吴冠军	如何研读思想人物	141
刘小平	邓氏“哈耶克研究”中的两条线及其启示	142
孙国东	消极自由：限度与悖论	143

书评思考

林 曦	历史远未终结 社会主义进行时——读《社会主义转型》	145
杨晓畅	厚薄之间的“理想图景”——简析邓正来“理想图景”建构中的两种理论取向	154

邓正来 “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 讲演录》序	164
曹 晋 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169
学者诗思	
纳日碧力戈 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174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177

“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

◆ 张小劲* 李春峰**

“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们普遍转向民主是政治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重大事件。在刚进入19世纪之时,民主都还带有贬义,意思是‘暴民统治’体系。可是现在,我们都成了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都极力宣扬民主的优越性并向人显示他们的民主凭证。”(安德鲁·海伍德,2008:156)但正是因为这样,民主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常见的政治术语,却同时也是最富争议且最为混乱的基本概念之一。按照海伍德的看法,有关民主一类政治概念的争议和混乱,源出于三大原因,一是历史现象描述与政治概念归纳之间的差异,二是政治实践者与政治研究者之间的区分,三是意识形态主张者与学术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安德鲁·海伍德,2008:3—4)。说到底,这是一种以政治学研究者为本位的问题认知方法,却多少有些将概念混乱之缘由归之外界的意味。然而,政治学研究者不能不研究特定的历史现象,不能不探讨政治实践者的政治主张及其行动结果,也不能不分析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基本特征。当然,在这样一种直面现实的学术努力中,尽管肯定不会澄清民主概念问题上原有的混乱局面,却无疑可以丰富政治学有关民主的知识积累。

由此观之,研究和探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显然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武装抗争20多年,建政全国60年,从而构成了值得研究和阐释的历史现象;也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政治主张影响着十几亿人民的生活状态;而且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意图开拓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示一种独特的政治图景;而这首先就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试图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民主话语。通过这套民主话语,中国共产党为其众多的普通党员确定了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政治纲领和理论观念,向亿万中国民众公开宣布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也明确提供了可以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足堪比较的社会参照和政治模板。

* 作者简介: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 作者简介:李春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级博士生。

此处所谓“民主话语”,从经验操作的概念界定来说,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就民主问题所做的论述和解说。就其实践功效而论,这些论述和解说往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具体的执政措施和制度设置;就其理论影响而言,这些论述和解说通常又构成为次一级面向大众的通俗解释和宣讲得以发展的基础性论证。

然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却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有关“民主”的理解和用意是多面向的,以至“民主”一词在这些重要文献中有着极其丰富的使用方式,表现出了历时性变化的特征。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意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表现出哪些主要特征?本文试图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量和质分析,以逐段聚焦的论说方式,对中共民主话语的变化过程与复杂面向给出描述和说明。

一、历史样本与历时性变迁:民主话语的通贯性描述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现行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①。然而,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非完全定时,政治报告的形式也可谓多种多样。在中共建政之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处于半秘密状态和长期战事之中的党组织无法从容召集任何意义上的正规集会,会议议程也过于紧凑。因而中共一大建党之时未有政治报告之议程;二大至五大则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作工作报告或政治报告,但其草拟和准备过程显然相当局促;六大则由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六大代表作政治报告,同时亦由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只是到了拥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时,即中共七大以后,政治报告才最终固定为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要议程并同时予以规范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李颖,2003;李君如,2007)。

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往往由指定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专职负责、由专门组建的写作小组经过长期而审慎的准备过程而写就,其间还需经过党内领导的多次讨论研究和反复修改而定稿,最后则由党的最高领袖或次最高领袖在代表大会上正式宣读,并在会议期间经由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再做部分修改而在会后作为党的专门文件而公开发表。因此,政治报告往往代表着党内高层领导所能够形成的政治共识,也能够汇集一般大会代表的关键意见,尽管其间也会出现矛盾和斗争^②。最重要的是,中共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是党的各种文件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涉及内容最为广泛,因而是说明论证最为充分的文件。因此,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具有最权威的代表性、最关键的说明性,可以准确地体现中国共产党视为最重要的理论主张、价值观念、政策方针和行动方略。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分析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或同类文件的文本,计量和考察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以及有关民主的不同用法,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出中共从建党到21世纪对民主理解的变化过程。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中共二大到六大的报告之议程并未规范化,而中共二大至六大都有较之政治报告更能体现集体意志和参会者共识的“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同类性质的“告全体同志书”,因此,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样本从二大到五大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一大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六大的《告全

^① 2007年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第3章第18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吴美华,2008:280)

^② 例如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陈伯达与张春桥等两派间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1545—1546)。

体同志书》^①；从七大到十七大则为通行意义上的政治报告。其中，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共面临战争胜利、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刻召开的，尽管就序列而言只是一次中央全会，但此次会议不仅内容极其重要，而且也有政治报告的议程，因而我们也将这次全会的政治报告纳入分析范围。这样，我们就有了 18 个分析样本，其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及其他同类文件

代表大会	报告者	报告日期	总字数*	文件
中共一大**	无特指	1921 年 7 月	904	《中国共产党纲领》
中共二大	无特指	1922 年 7 月	9343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三大	无特指	1923 年 6 月	835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四大	无特指	1925 年 1 月	2860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五大	无特指	1927 年 5 月	7338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六大	无特指	1928 年 11 月 11 日	7979	《告全体同志书》
中共七大	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	40565	政治报告
中共七届二中	毛泽东	1949 年 3 月 5 日	8412	政治报告
中共八大	刘少奇	1956 年 9 月 15 日	44499	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	林彪	1969 年 4 月 1 日	22382	政治报告
中共十大	周恩来	1973 年 8 月 24 日	9840	政治报告
中共十一大	华国锋	1977 年 8 月 12 日	31035	政治报告
中共十二大	胡耀邦	1982 年 9 月 1 日	31629	政治报告
中共十三大	赵紫阳	1987 年 10 月 25 日	23061	政治报告
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	1992 年 10 月 12 日	26280	政治报告
中共十五大	江泽民	1997 年 9 月 12 日	28330	政治报告
中共十六大	江泽民	2002 年 11 月 8 日	28127	政治报告
中共十七大	胡锦涛	2007 年 10 月 15 日	28002	政治报告

* 为统一统计之规范标准，总字数仅为正文之字数（包括标点符号），题目、署名及日期之字数不包括在内。

** 《中国共产党宣言》乃 1920 年所决定的，故采用《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作为中共一大分析样本。

① 二大至六大中工作报告/政治报告常引起党内种种或激烈或温和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并通过各种对外公布的决议案及宣言。例如，比较党的五大期间陈独秀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大会通过的宣言，可以发现二者在政策方针上有不同之处。五大政治报告在建立政权问题上主张：“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现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任建树，2009：290），而《宣言》则主张：“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中央档案馆，1989b：106）又如，在党的六大党代会上，瞿秋白于 6 月 20 日所作的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又由瞿于 6 月 28 日在会议上作《政治和报告讨论后之结论》的长篇发言，从其内容看足可反映出政治报告并非初始即为集体性产物（瞿秋白，1995）。基于《报告》与《宣言》在所反映出的集体意志程度及其个中观点之不同，加之二大至五大《宣言》及其六大《告全体同志书》在发布形式及其性质上的连贯性与相似性，我们以为，《宣言》及《告全体同志书》为分析样本更为恰当。

对于上述 18 份分析样本,我们首先可以对“民主”一词进行频次统计。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那些有限定说明之意的形容词,如民主管理(democratic management)和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中的民主,以及作为主语的名词,如社会主义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还有组合式的集合名词,如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等,都视为“民主”作为关键词而出现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简单的统计结果:从一大到六大,民主一词仅出现在二大的《宣言》之中(22 次)和六大的《告全体同志书》之中(2 次),但到了七大则大幅升高至 213 次,而后的七届二中全会却降至 18 次,八大又升至 76 次,此后的九大、十大又有大幅度的减少,从十一大开始则有明显的回升,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分别出现 61 次、46 次、51 次,但十四大较之十三大则又有下降,从十五大开始,民主一词再次逐次增高,至十七大则多达 67 次;以至于政治报告一经公布,大众媒体对此便有反复报道^①。

具体分析上述 18 个样本,我们还会得到更有意思的发现。例如,相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吁求和欢呼,中共一大没有采用任何关于“民主”的词汇,尽管与会者中不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甚至领导者。这似乎表明当时的建党一代更着意于阶级斗争,更关注于阶级专政问题。《中国共产党纲领》开宗明义便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中央档案馆,1989a: 3)。

表 2 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及同类文件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

	出现次数	“篇幅系数”		出现次数	“篇幅系数”
一 大	0	0	九 大	7	3
二 大	22	23	十 大	2	2
三 大	0	0	十一大	61	19
四 大	0	0	十二大	46	14
五 大	0	0	十三大	51	22
六 大	2	0	十四大	39	14
七 大	213	50	十五大	57	20
七届二中全会	18	21	十六大	58	21
八 大	76	17	十七大	67	23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 96)下,次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 102)。二大《宣言》由此也开始大量采用“民主”词汇,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但此时的民主词汇并非具有独立的实体意义,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概念框架下的一种对应式延伸。

^① 例如《中共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新局》,新华网 2007 年 10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7/content_6896712.htm);《海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cpcnews.cn/GB/100802/6388907.html>)等等;直到 2009 年庆祝建国 60 周年时,相关媒体仍对此有许多报道。

虽然二大大量采用了“民主”词汇,但三大、四大、五大的《宣言》中却没有“民主”一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词汇为其他一些表意相近、但界定不同的词汇所取代。如在三大的《宣言》中,“民主革命”为“国民革命”所取代(中央档案馆,1989a: 165—166),到四大的《宣言》又代之以“民族革命”(中央档案馆,1989a: 329—341),且在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反复提及“民族德谟克拉西”(中央档案馆,1989a: 390—395)。与此类似,在五大的《宣言》和六大的《告全体同志书》中,“民权”又替代了“民主”而反复出现。其中,在五大的《宣言》中,这一词汇出现的频次竟高达33次,并主张“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中央档案馆,1989b: 106)。但“民权”的提法到六大时即已严重消退,而在此后也再未出现。这种情形似乎表明当时的共产党在反对政治迫害和镇压的情况下试图提出自己的独特主张,但尚未形成有理据和有影响的概念提法。需要说明的是,“民主”虽然在六大的《告全体同志书》中作为非独立词汇出现了2次,但却是用以指称党内组织纪律性欠缺之负面意义上的“极端民主化”。这种批判式的使用是极少见的。

表3 中共一大到六大重要文献中与民主相关联的词汇(频次统计)

	民 主	民 权	民权主义	民主主义革命	民权革命
一 大	0	0	0	0	0
二 大	22	0	0	7	0
三 大	0	0	0	0	0
四 大	0	0	0	0	0
五 大	0	33	4	0	1
六 大	2	4	0	0	2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5年的七大时,在政治报告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竟高达213次,且主要用于表示反对国民党独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内涵。例如,“新民主主义”一词出现46次,“民主的联合政府”有9次,“民主改革”有12次,“民主党派”有11次,“民主分子”有12次。但在全国建政前夜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政治报告中出现最多的民主词汇则依次为“人民民主革命”(4次)、“新民主主义”(3次)、“人民民主专政”(2次)以及“民主联合政府”(2次);其中“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在前数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中均未出现过。

相对而言,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民主话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八大政治报告中“人民民主专政”一词的出现频次高达12次;更确切地说,在这里,“人民民主专政”已取代“新民主主义”而成为具有具体政体指涉意味的词汇。但八大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阶级联盟的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 82)。同时,八大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 87);此处之所谓“民主生活”一词并用来表示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此外,八大还强调了“党内民主”;这一词汇先后出现3次,且在具体表述中包含有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集体领导和商议合作、党员权利的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等与民主相关的价值要素。

但在八大之后,跟随而来的却是狂风雨式的阶级斗争。八大路线的中断,似乎印证着中共部分领导

人本想设计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民主将要在阶级斗争的狂潮中演变为“大民主”的狂欢。比较研究“文革”中的九大与十大的政治报告,就会发现,“民主”一词分别仅仅出现7次和2次,且根本没有用“民主”词汇来描述所执掌的政权。在此种政治环境下,有的只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与斗争,先前话语中阶级联盟的“民主”已经消散不知何处了。

在1977年举行的十一大上,“民主”一词在政治报告出现的频次虽然高达61次,但却很难将其作为中共开始构建其民主话语的开端。原因在于,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民主”词汇多用于回溯性的说明,如“民主革命”(11次)、“新民主主义革命”(4次)、“民主派”(18次)等等,而并未表现出重建价值和重修政体的用意。相形之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出现的频次竟高达50次,“民主集中制”一词也有8次之多。

表4 民主词汇在党代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

	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集中制	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	党内民主	基层民主	民主权利
七大	213	0	0	1	0	2	0	0	0	0
八大	76	0	0	11	12	0	0	3	0	1
九大	7	0	0	0	0	1	0	0	0	0
十大	2	0	0	0	0	1	0	0	0	0
十一大	61	0	0	3	0	8	0	3	0	0
十二大	46	16	0	0	2	7	1	1	0	1
十三大	51	5	12	2	4	2	4	2	2	1
十四大	39	3	3	1	4	3	1	2	1	2
十五大	57	7	5	2	3	3	11	1	1	2
十六大	58	4	10	2	2	2	9	2	2	2
十七大	67	3	10	4	0	2	11	5	4	4

说明:

1. “社会主义民主”出现频次不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词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出现频次。“人民民主”与“人民民主专政”亦如是。
2. “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出现频次为此四词出现频次之和。

从1982年的十二大开始,中共开始明显表现出重构社会主义与民主之关系的努力。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民主”一词出现了16次,并首次以一级标题的方式即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名目下专门讨论民主建设问题。在其后于1987年举行的十三大上,“社会主义民主”在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有所下降,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词则由十二大政治报告的0次上升到12次。十二大报告中并未对“社会主义民主”作出概念界定,而十三大报告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

家作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44)。进一步比较十二大和十三大的民主词汇变化,还可以发现,十三大“民主集中制”一词较之十二大下降了5次;同时,“民主决策”等用于描述政治过程的词汇开始出现;“党内民主”一词比十二大略有提高,且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的见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50)。显然,十三大是中共民主话语发展中的又一个高峰所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民主话语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又悄然复生。在1992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只有39次,“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分别出现3次,较之十三大有大幅的降低。而后,在1997年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和2002年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词汇出现的频次都在逐步增加。例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词在十六大报告中出现频次比十五大增多一倍。比较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还可以发现: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内涵更加具体化了。十四大并没有给“社会主义民主”做出界定,但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a:28)。十五大则重提“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30),十六大则进一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24);二是“民主选举”等政治过程性的词汇开始增多并规范化了。十五大报告中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并列提出,十四大报告中这些词汇出现的频次只有1次,而在十五大报告中则升高至11次,十六大报告为9次。三是“基层民主”的提法开始在中共民主话语中明显增重。十四大指出“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但仅是一句话带过;而十五大却专门论说基层民主,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32);十六大则进一步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25)。四是“党内民主”逐渐成为中共民主话语之重心。十四大到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党内民主”一词出现频次虽然没有增加,但关于“党内民主”的表述其分量却越来越重。十四大、十五大都指出要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39),并提出党内民主相关的制度与机制。五是“民主权利”词汇开始显现。比较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民主权利”出现次数分别为1次、1次、2次、2次、2次,十二大的“民主权利”是用在集体主义意义层面上,十三大、十四大的“民主权利”是用在党内民主层面上,而十五大、十六大的“民主权利”则分别用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各1次。

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是中共民主话语的一个宣言书。十七大报告论述民主问题的一级标题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十二大以来,“民主”一词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十七大为最多;“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没有出现,而“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民主权利”出现的频次均为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之最高次数;“人民民主”出现的频次在十二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为最高,“民主选举”等过程性词汇出现频次与十五大同为党代会报告中最高。同时,报告还将“党内民主”作为独立标题,而以往党内民主是放在民主集中制这一标题之下加以论说的。

如果将上述18个样本的篇幅和字数考虑进来,并对应以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我们还会得到一个可供比较的“篇幅系数”,从而能够以更简约的方式表现民主一词出现的频次与整个文件篇幅间的关联性。从频次和篇幅系数来看,18个样本表现出不确定的阶段性特征。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为一个阶段,但其中的二大有不同的情形;从1945年的七大到1956年的八大,为第二阶段;1969年的九大和1973年

的十大,构成了极特殊的样式;而1977年的十一大以后,属于第四阶段,但1982年的十二大和1992年的十四大略低于其他各次代表大会。而在每一阶段之中,也会有一些明显的波动。图1模拟显示了这种阶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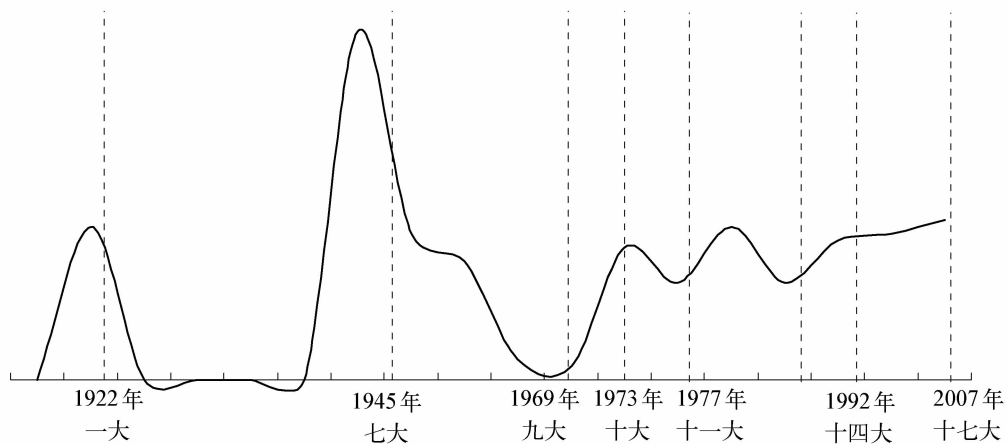


图1 中共民主话语发展的阶段性(以频次/篇幅为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情形,与中共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处境相关,更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对民主的认知相联;同时,民主话语也与中共所奉行的政治战略与策略相关。如果说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变迁特征可以从中共所经历的政治历程加以解释,那么,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我们更看重的是民主话语在第四个发展阶段中更具体的变迁图景和发展线索。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话语:从价值到制度

如果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拨乱反正”,那么构造其自身的民主话语,并以此既抚慰长期遭受政治运动冲击的党内干部和普通大众,又可凭以建立可阻止过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再次出现的某种机制成为“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并呈现民主的元价值^①。所谓“元价值”,在这里是指那种能够为次一级的其他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赖以为基础的、具有准则性质和核心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表述,依据传统的话语习惯,未必十分精当,却一定要能够朗朗上口、简单易记,并且能够为后续的解释留下充分的余地和空间。

从十二大以来党代会的历次报告看,中共通常都将民主的元价值视作“人民当家作主”,也即在更正式的表述中则为“人民民主”。这种“人民民主”的重点在于集体意义上的民主,而非个体权利的民主^②。然而,人民或广大人民,作为一个集合名词究竟何指?是每个个体的叠加和累积,还是只能作为集体而存

^①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涵的变迁,已在党代会民主词汇变化一节中有述。

^②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邓小平,1994:175)关于民主概念的意义表述,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44),将人民当家作主与公民权利联系起来。

在,这引起无穷的争论;而且,人民民主比崇尚个人权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千百万倍”的断论也无法简单地说服大众。因而,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而言,最为困难的是集体性的价值概念不容易转换成切实的民主实践^①。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经济社会的成长及人民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那种只强调元价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的民主话语已经不能适应实践发展。正如有学者曾言:“那种只揭示‘人民民主’的‘实质’而对其实现途径语焉不详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利益主体之‘民意’的表达和贯彻的要求。”(陈明明,2008)因此,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共民主话语的发展都必须面对这个核心问题——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民主话语变迁的基本脉络,显然可以发现,民主话语的生成与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价值与实践互动而生发的经验形式概念、制度性的民主概念与民主制度化的概念之发展、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位移到党内民主的话语转换,都体现了中共本身对于其民主元价值如何实现所表达的关切。易言之,人民民主的实践问题成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民主话语之变迁和发展的重要线索。结合中共最高领导的相关论说,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发展特征。

发展特征之一:价值与实践互动而生发的经验形态概念的提出。

对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如何实现这一根本性问题,1990年代以前,在中共的政治文献中曾大量用“民主化”的概念来加以表述。例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1994:336)在这里,民主显然是已经确定和确立的,而将之“化”为实践和现实则成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然而,尽管“民主化”的提法将民主概念的范围扩及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维度,但并未解决民主化究竟通过何种具体可行的途径和方式来实现的问题。正是在这里,1980年代以来,基层自治与管理的实践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形式结构的完善,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过程性概念分别用于中共各类政治文献中。概念的大量使用促使了民主话语规范的提升,十五大报告终于将这些民主概念进行了统合处理,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31)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25)显然,这四个过程性概念已用来专指“人民当家作主”如何付诸实践的基本形式概念。时至今日,这又被称为“四大民主”^②,因而又与“文革”时期盛行一时、后又载入宪法的旧式“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王培英,2007:183)构成了有意思的对比。

发展特征之二:制度性的民主概念与民主制度化的概念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民主话语中又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制度性概念不断增多,其中似乎又包含两个

^① 相对于西方那种主要的民主概念与话语立基于实践经验而产生的情形,民主在中国则大多是概念与话语的先行导入,对于政治实践者而言,对于民主问题相应地也是先有价值上的演绎,而后再力图付诸实践。此一问题涉及中外民主路径之比较,此处难以详论。

^② 虽然“四大民主”这一提法并未在中共重要文献中出现,但已在基层机构文书或新闻报道中出现使用。见《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探索与思考》(<http://huiyong.mca.gov.cn/article/gzyj/200812/20081200024427.shtml>);《“四大民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http://web.yuhang.gov.cn/class/class_43/articles/4446.html)。